

中国文学年鉴

ALMANAC OF CHINESE LITERATURE

中国文学年鉴社

2006

现状考察 · 热点聚焦
作品选载 · 研究综述
论文摘要 · 论著评介
学术会议 · 文坛史料
文坛纪事 · 资料辑要

中国文学年鉴

2006

中国文学年鉴社

《中国文学年鉴》编辑委员会

主 编：杨 义

副主编：白 烨 陶国斌（常务）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中忱	王烈耀	叶舒宪	白 烨	包明德
刘扬忠	刘跃进	吕 微	李伊白	李继凯
杨 义	吴秉杰	陈 飞	陈 洪	陈晓明
张 强	张中良	孟繁华	赵存茂	胡 明
高建平	党圣元	陶文鹏	陶国斌	曹顺庆
温儒敏	朝戈金	雷 达	黎湘萍	

《中国文学年鉴》编辑部人员

主 任：赵存茂

编 辑：（以姓氏笔画为序）

毛晓平	牛松丽	严 平
邱 建	陈定家	周永琴

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协办单位：安徽大学中西文艺理论融合研究所

杭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南通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

编辑出版者：中国文学年鉴社

国内统一刊号：CN11-4096/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代号：ISSN 1672-0814

地 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电话/传真：(010) 85195621

E-mail: nj-wx@cass.org.cn

印刷者：北京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7年5月

目 录

现状考察

新世纪文学：跨出新文学之后的思考·····	张颐武 (3)
影响新世纪文学的几个因素·····	杨 扬等 (10)
“新世纪文学五年”与“文学新世纪”之我见·····	张 炯 (17)
大众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四化”·····	贺绍俊 (19)

作品选载

· 长篇小说 ·

秦 腔 (故事梗概)·····	贾平凹 (27)
平 原 (故事梗概)·····	毕飞宇 (34)
圣天门口 (故事梗概)·····	刘醒龙 (39)

· 中篇小说 ·

林老板的枪·····	杨少衡 (45)
报告政府·····	韩少功 (65)
在路上行走的鱼·····	胡学文 (99)

· 短篇小说 ·

娃的心,娃的胆——三秦人物摹写之一·····	陈忠实 (118)
看 秋·····	刘庆邦 (123)
北京的金山上·····	张抗抗 (128)
下一个是你·····	映 川 (136)

· 散文· 随笔 ·

重读胡乔木——文海钩沉·····	从维熙 (146)
根之魂——夏祭黄帝陵·····	郭宝林 (150)
扇嘴巴子的故事·····	李钢林 (153)
做个平民有多难——我的财富观·····	韩小蕙 (159)
似真似幻东洋花·····	李兆忠 (164)

· 报告文学 ·

我们可以称他是伟人——速记中国农民吴仁宝 (节选)·····	何建明 (169)
高考殇 (节选)·····	舒 云 (183)
“超女”!“超女”!·····	吕 辉 (202)

· 诗 歌 ·

大江奔流	路 也 (223)
少 年	周建歧 (223)
田园诗	王家新 (224)
四吨书	雷平阳 (224)
野草湾	李 南 (394)

研究综述

文艺理论研究综述	吴子林 (227)
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综述	马银琴 (233)
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综述	许继起 (241)
唐宋文学研究综述	陈才智 (250)
元明清文学研究综述	刘 倩 (267)
近代文学研究综述	王达敏 (278)
现代文学研究综述	段美乔 (284)
当代文学研究综述	邓玉环 (295)
台湾文学研究综述	李 娜 (303)
比较文学研究综述	王 蓓 路 坦 (310)
民间文学研究综述	施爱东 (317)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综述	刘亚虎 尹虎彬 汤晓青 刘大先 (338)

论文摘要

文学理论反思与“前苏联体系”问题	钱中文 (355)
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美学观	曾繁仁 (356)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	陶东风 (357)
从形象到拟像	金惠敏 (358)
评文艺理论研究中的“文化主义”与“审美主义”	王元骧 (359)
论艺术类型的划分	胡家祥 (360)
当代文论精神症候与文化空间拓展	王岳川 (360)
网络文学研究的视角与热点	欧阳友权 (361)
文学理论的“他国化”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	曹顺庆 (362)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历史范畴的二重意义	顾祖钊 (363)
文艺学的身份认同与知识形态的重构	
——全球化语境下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基本任务	李西建 (364)
重构一种陈述——关于当下文艺学的学科检讨	金元浦 (365)
蒋孔阳晚年美学思想的新发展	张玉能 (366)
“词”格与“像”格——论影像修辞格的含义	李显杰 (368)

由人学到天学的《诗》学诠释——《诗纬》诗学研究	刘毓庆 (369)
“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	赵敏俐 (370)
论五言诗的起源——从“诗言志”、“诗缘情”的差异说起	戴伟华 (371)
齐梁文人隶事的文化考察	何诗海 (372)
“四声之目”的发明时间及创始人再议	高华平 (373)
从明道到载道——论唐宋文道关系理论的变迁	刘真伦 (374)
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史新视野	胡可先 (374)
张祜与元白诗派的离合	陈才智 (375)
诗歌与政治——读王安石《诗义》札记	张三夕 (376)
清代科举八股文的衡文标准	龚延明 高明扬 (378)
藏传密教与《西游记》 ——蔡铁鹰《〈西游记〉成书研究续论》	胡小伟 (378)
龚自珍与20世纪的文学革命	谈蓓芳 (379)
试论嘉庆年间小说的新变	袁进 (380)
二十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和现代性	陈友康 (381)
中国现代诗歌与古代诗歌意象艺术略论	王泽龙 (382)
从《新世纪》到《新青年》：无政府主义与五四文学革命	张全之 (383)
延安文学及延安文学研究刍议	袁盛勇 (384)
从《宝马》看经典重读的必要性 with 可能性	秦弓 (385)
“赵树理模式”与“当代语境”的复杂关系 ——关于《为农民的写作与农民的“拒绝”》一文的几点商榷	席扬 (386)
“梦中的女孩” ——鲁迅《在酒楼上》细读	张直心 (387)
重返“新时期文学”的意义	李杨 (388)
尴尬的文坛地位与暧昧的文学史段落 ——“主旋律”小说的文学处境及现实命运	刘复生 (389)
消费时代报告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 ——当下“报告文学综合症”的八个视点	龚举善 陈小妹 (389)
批评制度与批评观念 ——关于新世纪文学批评的思考	贺绍俊 (390)
言说的疆域 ——浅谈大陆学者所撰台湾文学史的理论视野	袁勇麟 (391)
漫游·时间寓言·语言乌托邦——解读《海东青》的多重方法	朱立立 (392)
艾布拉姆斯四要素与中国文学理论	王晓路 (393)

论著评介

《诗与意识形态》	李春青 (397)
《中国作家精神寻根》	熊元义 (398)

《多媒体艺术》	谷时雨 (398)
《文艺的心理阐释》	胡家祥 (399)
《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	欧阳友权 (400)
《冲突与重建——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问题》	张荣翼 (401)
《说文解艺》	杜书瀛 (402)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问题》	冯宪光 (403)
《回归实践论人类学——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新解读》	曾永成 (404)
《中西文艺理论融合的尝试——兼及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顾祖钊 郭淑云 (405)
《中国古代歌诗研究》	
..... 赵敏俐 吴相洲 刘怀荣 钟 涛 方 铭 沈松勤	陶允冀 (406)
《中国辞赋源流总论》	曹 虹 (407)
《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	许 结 (408)
《道家文化与太极诗学》	刘介民 (409)
《先秦两汉文学史科学》	曹道衡 刘跃进 (409)
《魏晋南北朝谏碑文研究》	黄金明 (410)
《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	景遐东 (411)
《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	任文京 (412)
《唐代诗人探赜》	王辉斌 (413)
《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	马自力 (414)
《白居易〈长恨歌〉研究》	张中宇 (415)
《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	陈元锋 (416)
《南宋文人与党争》	沈松勤 (417)
《宋词的文化定位》	沈家庄 (418)
《苏门六君子研究》	马东瑶 (418)
《元代文学编年史》	杨 镰 (420)
《清代辛稼轩接受史》	朱丽霞 (421)
《朱彝尊〈词综〉研究》	于翠玲 (421)
《红学通史》	陈维昭 (422)
《20 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	郭延礼 (423)
《晚清民国传奇杂剧考索》	左鹏军 (424)
《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一种综合的文化、文学考察》	李 楠 (424)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	温儒敏等 (425)
《胡适思想与中国文化》	胡 明 (426)
《“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	姜 涛 (427)
《延安鲁艺风云录》	王培元 (428)
《个性主义的悲剧——解读丁玲》	张永泉 (429)
《中国新诗学》	杨匡汉 (430)
《长篇小说与艺术问题》	吴义勤 (431)
《台湾文学思潮与渊源》	朱双一 (432)

交叉与融通：文艺学学科建设 2005 高峰论坛	(435)
文学—文化研究与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	(436)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第 14 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	(438)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论及批评发展状况”研讨会	(439)
2005 “新时期文学理论回顾与展望”全国学术研讨会	(440)
“纪念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440)
第二届中国韵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441)
21 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论坛	(443)
2005 年中华文学史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444)
中国古代戏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445)
古代文学学科建设暨学术研究座谈会	(446)
第五届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	(448)
北京 2005 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	(449)
第四届中国古代小说文献与数字化研讨会	(451)
明代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第三届年会	(452)
“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历史与理论”学术研讨会	(453)
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第四届年会暨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455)
“杜甫诗歌与时代精神”国际研讨会	(457)
海峡两岸中国古典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457)
第五届《文学遗产》论坛暨编委会扩大会议	(458)
2005 中国·洛阳白居易诗歌国际研讨会	(460)
纪念黄庭坚诞辰 960 周年暨逝世 900 周年学术研讨会	(460)
纪念陆游诞辰 880 周年暨越中山水文化国际研讨会	(462)
海峡两岸明清小说研讨会	(463)
文学与信息技术国际研讨会	(463)
“中国古代散文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464)
“东亚现代文学中的战争与历史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	(466)
《新青年》暨现代文学高层论坛	(467)
回顾与展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	(468)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观研讨会	(468)
张恨水抗战作品学术研讨会	(469)
“新世纪文学五年与文学新世纪”学术研讨会	(470)
“2005·北京文艺论坛”	(475)

沈从文的一九五一年	张新颖 (481)
从一封未刊信看臧克家与《诗刊》初创	徐庆全 (483)

文坛纪事

2005 年中国文坛大事记 白 烨 何 鹏 (489)

弘扬抗战文艺精神 繁荣当代中国文学

——中国作家协会在京召开纪念抗战胜利 60 周年座谈会 (502)

文学界沉痛悼念巴金 (504)

巴金追思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 (506)

资料辑要

《全国性文艺新闻出版评奖管理办法》出台 (509)

中宣部有关负责同志就《全国性文艺新闻出版评奖管理办法》答记者问 (509)

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在深圳颁奖 (511)

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揭晓并颁奖 (512)

年度辞世文学家 (514)

当代艺文志

安徽大学中西文艺理论融合研究所 (523)

南通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 (524)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525)

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 (526)

楚雄师范学院中文系 (527)

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 (528)

浙江丽水学院刘基研究所 (528)

海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 (529)

三江学院中文系 (530)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 (531)

山东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 (532)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 (533)

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 (533)

编后语 (534)

现状考察

寒 冬 集

新世纪文学：跨出新文学之后的思考

张颐武

1

对于“新世纪文学”的思考已经成为当下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一个核心命题。研究者已经普遍注意到进入“新世纪”之后文化和文学发生的一系列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的深刻性已经是一个新的文化时代的表征。这个文化时代的意义可能由于其刚刚展开而尚未被人们所深入理解和探讨，但其重要的地位已经完全凸现了出来。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中我曾经提出：“20世纪90年代正是中国全球化和市场化经过了80年代的试探和探索，度过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阶段，进入了一个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前期’，其文化已经具有了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初步的特性，乃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为中心的文化系统正在经历转变的‘过渡性’阶段。今天，这一‘过渡性’阶段已经趋于完成。而目前的文化显然已经具有了不同于90年代‘后新时期’的中国全球化和市场化前期的文化的新的特点和表征。一种‘新世纪文化’形态已经隐然成形⁽¹⁾。”在今天看来，当年隐然成形的一切已经完全凸显了其新的特质和新的文化形态。这是一个新的文化和文学时代的来临。

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人们的关注点是“后新时期”与“新时期”文学的差异性的展开，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社会正在迅速到来，这个时代的精神层面的景观尚未明晰，而其强烈的“过渡性”又让未来显得模糊而暧昧。整个对于文化的思考和判断都集中在对于这一急剧到来的进程尚未呈现的“后果”追问之中。人们对于这一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后果”的不同的思考导致了90年代中国文学和文化领域的一系列剧烈的论战和分歧。关于“人文精神”和“后现代”、“后殖民”问题的大讨论正是对于中国这一历史进程未来的预言的不同选择的结果。

知识分子和文学是与这个时代彻底决裂，还是阐释和认知这个时代？90年代是“现代性”的伟大

理想的失落和衰竭的最低点的“废墟”，还是一个“后现代”新的可能性的展开？90年代进行的几场讨论都将问题推到了对于未来“结果”的预测和探索的尝试之上。今天我们重温当时的论战和探讨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修辞性的和历史性特点，这就是人们对于90年代的看法其实是有一个对于未来的“结果”的预言为基础的。对于未来的预言主导了对于“当下”的思考。许多人正是基于对新的时代必然走向失败的判断而将之彻底否定的。他们都有对于未来的异常明确的预言作为对于“结果”的表述。由于这个结果的必然的失败，现实的一切当然也就完全失掉了合法性。如果说，“五四”一代的“现代性”为我们承诺了一个光明的未来，用这个未来的希望作为否定现实和批判现实的基础，那么，90年代的“全球化”和“市场化”语境中的“现代性”却是以一种耸人听闻的对于未来失败和混乱的“结果”的表达而达成对于现实的否定。如最有代表性的《人文精神寻思录》中就指明了：“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民族真的可以不要诸如信仰、信念、世界意义、人生价值这些精神追求就能生存下去吗？”⁽²⁾这个提问所表达的对于未来的阴郁的看法和对于当下文化形势的阴郁的看法以一种“似真”的形态表达出来。这一设问其实并没有现实的根据，但它直接指向我们对于现实的想象。于是一个未来的必然结果被设问所合法化了，没有“信仰、信念、世界意义、人生价值”变成了现实的前提，而中国的失败变成了这一前提的必然后果。这实际上是一部分文学和文化精英对于未来的预测。他们从日常生活的消费主义化的经验出发，按照中国“现代性”中的消费文化难以存在的固定的历史经验，如晚清到民国时期的消费文化的失败和合法性危机，对于未来的“结果”作出了判断。这一判断变成了一种精英主义式的对于历史的看法，也就是历史必然以失败告终的判断。这一判断导致了一种所谓“末世”的心态。这种心态一面导向了90年代中国

文学的激进性的表达。如张炜、张承志等人的作品，其彻底否定时代存在的合法性的激情和对于社会和普通人的欲望的否定性的判断，都显示了“五四”以来新文学前所未有的不安和烦躁。这种不安乃是对未来“结果”的否定的直接的效应。其次，90年代文学的颓废性的表述也指向了这种对未来的“结果”的深刻的失望情绪。如王朔的《我是你爸爸》、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这样的作品，以及许多实验小说家的作品，如苏童的《已婚男人杨泊》之类的文本，都显示了和“五四”文学的激昂慷慨的未来预言完全不同的路向。应该说，对于未来强烈的失败意识导向了一种对于颓败的历史和现实的表现，历史并不是朝向一个理想的乌托邦行进的，而现实的危机则更喻示了一个无可把握的世界。这些作家其实都已经敏锐地发现了原有现代性的历史框架的失效和失控的状态，但对于未来结果的预测却也由于这种状态的存在而发生悲观和失望的表现。无论是愤怒的批判和谴责，还是直截了当的颓废的虚无，这两种反应其实都是中国“现代性”历史在“后新时期”面临一种危机的表征，它们不是对于“现代性”的信心的重申，而是“现代性”面临剧烈挑战的危机状况的“后果”。这里出现了有趣的问题，由于担心新的历史的不祥的“结果”，中国作家用一种特殊的写作姿态将自己变成了一个过去的宏大的“现代性”的“后果”。

这种特殊的“后新时期”的精英文化，其实喻示了两个方向的问题：首先，在历史的层面上，“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性”历史的展开，从来没有一个让日常生活成为社会关切中心的机会。紧迫的阶级斗争和民族危机不断地要求一种宏大的历史表达。中国深刻的悲情和失败与屈辱的现代历史，淹没了具体的日常生活的选择。间不容发的历史进程不可能有一个平静的、细小的生活展开的可能和条件，也不可能有一种在日常生活中满足的机会。我们的历史总是充满了悲壮的牺牲、剧烈的斗争和波澜壮阔的活剧。其次，在观念的层面上，“五四”以来几乎没有对于一个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的阐释和表达，对于日常生活和平淡的市场社会几乎没有一个具体的观念性的表述，人们似乎无法接受一种日常性的生活形态的存在。这种历史层面和观念层面的“现代性”的展开将日常生活压抑在一个非常

狭小和有待彻底超越的状态下。这并不是说，日常生活的满足并不是在整个现代性历史中不存在，而是被“悬置”于一个遥远未来的乌托邦之中、一个不可思议的历史的终点之处。但我们的“现代性”对于这一历史终点的表述始终显得暧昧不明。这个终点的到来将使得历史终结，在日常生活中获得满足，而我们正是向这一目标无限趋近的过程的一个环节。但同时，这一历史的终点又是在整个世纪历史的终极之处，所以并不是任何现存的人或者今后的具体的时间中可以得到展开的东西。于是我们的现代性就有一个难以回避的悖论。日常生活或对于消费满足的承诺指向了一个异常遥远的未来，但现实的必然的压抑性和对于日常生活的否定的合法性却反复受到了肯定和支持。它们也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价值的所在。

正是由于历史和观念这两方面的原因，一旦面临这样新的市场化带来的日常生活的追求凸现的情况，中国文学就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焦虑和不安。整个“后新时期”的文化和文学都面临着一个异常难以应付的困扰的挑战，我们将消费主义和市场化的结果想象为一种必然的负面性的展开。正像一位论者在总结90年代的文化时提出的严厉的批判性的表述所点出的，我们被一种市场化的“新意识形态”所笼罩。这个“新意识形态”的表述有自己的逻辑和依据，因为新的市场化建构的社会共识是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中罕见的。他认为，90年代以来，“公众的注意力已经明显朝改革社会经济，甚至仅仅是改善个人物质生活的方向偏斜了。而一种视个人物质生活的改善为人生最大的目标的狭隘的功利意识，也就在社会各阶层顺理成章地蔓延开来。”⁽³⁾他异常悲伤地指出由于种种症候的出现，社会面临危机的悲惨的景观，“工厂倒闭、失业人口增加，更是教育败坏、生态恶化，是一部分执法机构的逐渐流氓化、社会信用体系日趋瓦解，是道德水准的普遍下降……一旦这些因素汇集起来，交叉感染、社会整体性的破产也就为期不远。”⁽⁴⁾这些对于“结果”的必然性的预言正是来自于我们在历史和观念层面上对于消费主义和日常生活的蔑视。

但这里其实出现了最为尖刻的“历史的讽刺”。中国的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结果”居然使得原来必然失败和破产的“结果”没有实现，反而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历史的发展和中国的“和平崛起”的新的历

史景观。中国内部的千百万人民改变自己的生活的梦想,或者按照这位论者所言的“视个人物质生活的改善为人生最大目标的”新的“中国梦”不仅没有使得“社会整体性破产”出现,反而在新世纪的新的背景下,有了一个令人惊异的新的中国的全球形象。这个中国崛起的历史景观,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使得20世纪70年代以来开始的全球性的信息革命有了新的基础和动力。中国内部的市场化的进程正好在一个新的全球格局之下展现了前所未有的价值。

对于我来说,这一发展的意义在于,它从根本上脱离了、突破了“中国现代性”所限定的历史和观念的限制。我们惊讶地发现,消费主义和日常生活当然有许多负面的影响和深刻的问题,但如果从今天的“结果”回溯90年代的“后新时期”,无疑可以发现,这个世俗化的时代,这个饱受抨击和蔑视的、被认为丧失了“理想”和“崇高”的时代有着远比我们所看到的更为积极的意义。我们可以用美国的例子来稍加说明,据美国文学研究者蒋道超在研究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消费主义浪潮时指出:“我们到底如何看待美国20世纪兴起的消费主义文化固然很复杂,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即它确实影响了美国几代人的成长,它确实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消费文化不仅使美国经济腾飞为世界强国,而且使美国文化走向世界。”⁽⁵⁾而这也正好印证了美国史研究者的判断,美国在“世纪之交迈上了位居前列的世界强国之巅,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颗新星”。⁽⁶⁾美国的状态显然提供了另外一种“现代性”的想象,与消费主义相关联的未必是民族的失败和屈辱,反而可能是一种重要的积极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它的这一波的发展只有英国的工业革命可以比拟。而在我看来它非常像美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状况。这当然是一种“意识形态”,但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意识形态”远不像我们在90年代想象的那样消极和负面。它反而可能使得“五四”以来中国的发展目标得到实现。这个来自国际的表述提供的视角恰恰可以质疑90年代以来中国内部对于消费主义的极其消极的表述。这种表述的基础并不是反对经济成长,因为“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性几乎没有一个反对经济成长的话语,但却对于消费主义的“后果”的消极性和负面性有

非常自负也非常武断的判断。这种判断正好也被已经来临的文化后果所否定。历史并没有进入一个彻底的失败和倒退的惊人过程之中,相反,在新世纪之后反而显示了新的活力。原有的历史框架一直将一种“五四”“现代性”批判和否定之物视为必然导向失败和颓败之物,但我们的预言的失灵使得旧的20世纪的历史框架没有了自己的原有的绝对的价值。中国的确有了消费主义和日常生活主导的新的历史,但却没有出现人们所预言的失败和绝望。同时,原有的话语对于消费主义和日常生活的排除也发现自身并不具有合法性,消费主义和日常生活由于有了中国崛起这一“五四”以来人们梦寐以求的目标的迫近而具有了新的含义,对于它的压抑和忽略已经无法延续了。

于是,在原有“新文学”历史框架和话语结构的束缚之下的文学不得不面对着众多的对于自己的超越。所谓“新世纪文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框架之下展开的。

2

“新世纪文学”的展开所不得不处理的正是90年代的“后新时期”文学面对的“结果”的变化。新时代的作家不得不放弃原有的历史框架和话语框架。“现代性”在90年代的“后现代”中仍然支配人们头脑的东西现在不得不被抛弃。于是,我们发现一种新的历史意识的出现和一种新的社会观念的出现变成了“新世纪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首先,历史观念的变化表现在两个方向上:第一个大类型是新一代的青少年作家开始了一种所谓“架空性”的写作。大量神怪、奇幻、灵异小说开始出现。这种“架空性”乃是创造一个和当下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架空性”。它们都并不来自现存的历史,也不是对于历史的反应。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奇幻文学”,以类似电子游戏的方式展开自身,它也完全抽空了社会历史的表现,而是在一种超越性的时空中展开自己的几乎随心所欲的想象力。像郭敬明的《幻城》、韩寒的《长安乱》或者阳光的《明光魔琴》,以及网络作家今何在等人的作品。⁽⁷⁾

这被称为所谓“架空”小说。这种“架空”就是一种凭空而来的想象,一种“脱历史”和“脱社会”的对于世界的再度编织和结构。它们并不反映

我们的现实，反而是创造一个现实。这种对于现实的超验的创造其实是一个类似“星球大战”的世界，这里有一切，却并不是我们生存的空间。于是这是一种“架空”的文化。在中国“新文学”的整个传统中，幻想文学一直是一个并不受到重视的边缘。在这里有两个潮流是值得注意的。一是社会讽喻或教育类型的幻想文学，作家以幻想作为社会批判和“国民性”反思的途径。如老舍的《猫城记》和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1949年之后，更将幻想文学作为教育青少年的工具，如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就是代表作。二是科学幻想类型的幻想文学，也就是对于科学的发展进行预测的小说。1949年后随着苏联科幻文学的引进而有较大的发展，在“新时期”初期的“科学的春天”时期有过一段兴盛期。这两类文学都是启蒙时代思潮的表征，“国民性”的反思是为了唤醒民众觉悟，而科学幻想则是为了开启民众的智慧。但它们其实都是在文学主流的边缘之处，无法和对于社会现实的紧迫的反映相比拟。幻想文学一直被视为一种较为次要的文类，也是作为一个现实的“寓言”来处理的。这当然和现代中国紧迫的民族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以及中国的“弱者”的境遇相关。中国“现代性”已经有一个关于国家富强和个人解放的异常具体而坚实的中国梦，也就不需要另外的幻想文学。伴随着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新时期的到来，一个较为富有、较为优裕的时代已经来临，中国的“脱贫困”和“脱第三世界”的进程所创造的“新新中国”使得中国的青少年开始成为消费的重要力量。他们开始享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物质性的满足。当日常生活的基本满足不再成问题，幻想文学也就有了自己更加坚实的物质性的基础。而一个电子游戏所创造的逼真的“超现实”的幻想世界的建立也为幻想文学提供了新的想象力的空间。

这是来自于“尿不湿一代”的独特选择。21世纪初的青少年文化已经进入了“尿不湿一代”主宰的时代。所谓“尿不湿一代”其实就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的婴儿逐渐开始使用纸尿裤之后生长的一代人。当时“尿不湿”这种新的产品的使用其实是一个消费社会开始降临的标志。它一面将“用过即扔”的文化建立在婴儿阶段，意味着一种便捷的方式为父母摆脱尿布的烦琐提供了服务；另

一面，也减少了父母和孩子的交流的时间，放任了孩子的自由的宣泄的可能。“尿不湿”的逐渐被采用其实自有其象征意义，它说明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丰裕的一代人的出现和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其实是异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尿不湿一代”现在已经开始长大了，他们已经显示了一个物质开始丰裕起来的社会里的新的青少年的趣味。他们现在已经成了文化消费的主力。由于成长在中国可以说最丰裕的时代，没有过去的悲情和重负，他们的感情和情绪就没有那么沉重，又有中国近二十年高速经济成长带来的财富的物质基础。这些青少年成了中国现代以来最敢于消费的一代。他们的趣味和爱好现在主导了文化消费的走向。他们买书，韩寒和郭敬明就变成图书市场的主导力量；他们玩游戏，陈天桥就成了IT首富；他们崇拜偶像，周杰伦、F4就成了超级明星。这种力量的展现使得他们可以在文化的趣味上充分地炫耀自己的高度的丰富性和高度的游戏性。他们一面有其生涩的成长的烦恼，一面却也是一股无法阻挡的支配创意性的文化产业发展的力量。

首先，这些架空性的作品是一种青少年自由联想的感性的自由书写，是无拘无束的幻想性的直接的表征。这些作品一方面在来自书或故事的知识资源的基础上调动一切想象的元素，将原有的逻辑性的历史性打碎，变成一个新的世界奇幻空间的自由展现。另一方面，则通过电子游戏所具有的奇特的灵感，跨越人与神、时间和空间、东方与西方的界限，通过幻想创造一个直接诉诸感性和想象的直接性的自由的空间。因此，这些作品是极度想象力的产物，它们超出了现实世界的局限，和现实几乎没有必然的历史联系。它们仅仅来自孩子的奇思妙想。于是对于这样的幻想文学来说，架空性的写作才显示了自己的长处。它不需要对于社会的常规和理性的秩序做深入的表述，而仅仅依靠自由而奔放的想象力就可以存在了。其次，这些创造已经完全脱离了现代中国的历史的限定性，而变成了一种和普遍性的“人类”的想象相关联的想象。这里已经没有中国“现代性”的幻想文学的那种强烈的感时忧国的意识，也没有作为“民族寓言”的沉痛的宣告，而是非常轻灵自如的片刻想象的产物。在《时光魔琴》或《秦人部落》中的卡特星球，虽然构成故事的背景，却并不引发对于中国的表述，而是孩子的

幻想的直接性的产物。于是我们发现中国幻想文学的原有的高度的滞重性已经消失。幻想就是幻想，这个天地已经跨出了具体而微的“中国”的一般性的限定。孩子已经开始具有一种新的全球性的视野。想象的世界已经不仅仅依赖一个民族的特殊经验，而是依赖非常广阔的自由的想象的存在。

第二个大类型是对于中国历史的重述和再架构。这种重述和再架构不同于90年代的相当多的历史小说的强调历史的叙述的空洞性和虚无性的颓废姿态，也不同于对于历史的坚信和确认。而是在“新文学”的历史框架之外再述历史。

钱宁的《圣人》是对于千百年来不断被重复讲述的孔子的故事的一个别出心裁的重复。这个“孔子”的故事是一个几乎不断缠绕中国文化的故事。我们一旦面临文化和社会的巨大转变，总难免回到孔子去寻找自己的精神支柱。在现代中国，一面是民族的危机导致的全面反传统的精神总是以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否定作为一个新的社会出现的前提，另一面，却又不断将孔子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来看待，试图从孔子汲取精神的力量。这种矛盾性的现象凸显了孔子乃是中国人精神最深处的东西，有关他的截然两极的判断正是中国的“现代性”历史的矛盾性的表征。这一矛盾性的关键在于一个难以超越的悖论：中国的“现代性”的生成乃是以对于传统的否定为前提的，没有这种否定，“现代性”就难以存在；但如果彻底地否定中国的传统，这个民族生存的理由将不复存在。于是我们在孔子面前的极度的矛盾的态度正是现代中国本身的矛盾性。于是孔子怎样都无法摆脱“圣人”的命运。他或者是一个负面的“圣人”导致了中华民族的停滞直到沉沦；或者是正面的“圣人”，是中国文明的生存发展的关键。但今天中国所发生的历史剧变已经完全超越了中国“现代性”的框架。中国的“脱贫困”和“脱第三世界”的进程让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弱者”形象，成为世界上的“强者”之一。这一中国历史的转折让我们有了超越对于孔子的两极看法的可能。而钱宁的《圣人》正是试图将圣人凡人化，将圣人放在自己的语境中加以再度表现的作品。他在中国“和平崛起”的新的历史时刻再度将孔子摆上了台面，让孔子重新介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我们当下人生的一部分。《圣人》将孔子那个中国历史上变动最迅速、社会形态和价值观最多元的

时代进行了饶有兴味的表现。它凸显了孔子作为一个中国精神的象征性人物所具有的巨大的价值和他在自己的时代不断试图为时代的紧迫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雄心。孔子对于自己的时代的状况的理解在钱宁的笔下是矛盾的。一方面，孔子对于“礼崩乐坏”的现实充满了忧患和不安；另一方面，他又始终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乐观主义者，始终对于时代抱有信心和期望。孔子一面试图从过去寻找今天的行动的指南，另一方面却又不间断地创造新的可能。孔子好像在重复过去，其实他时刻在寻找现在的可能性。孔子在钱宁笔下是一个寻找时代关键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思想者，他只是在借助过去的幽灵的力量试图给予自己的时代一个新的思想。他和许多哲人一样，借助于对过去的“重复”来寻求新的表述。作品采取一个双重的叙事结构。单数章节是孔子周游列国、进行他一生最重要的政治努力的故事，双数章节则讲述孔子从出生开始的历史。这个结构巧妙地处理了孔子思想的成熟期和他的成长史的关系，让我们可以一面看孔子的坚韧不拔的努力的同时看到他的成长，让我们得到孔子的最为精华的人生段落的同时了解他的成长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圣人的平凡的一面，看到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一面，看到一个凡夫俗子如何变成不平凡的圣人的。孔子的精神其实正是为了理想而不断进取的精神，是一个没有权力的小人物试图让时代和未来理解他深邃的思想的精神。这里执著和坚韧是孔子精神的核心，一种来自内心的坚定、对于理想的顽强让孔子能够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中不放弃。但孔子也有高度的灵活性，他明白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思考和新的行动，理想必须得到现实的回应。他的执著使他不放弃，而他的灵活使他能够找到思想的空间。虽然他的政治追求不断受到挫败，但却能够不断传播自己的思想，能够让他的观念被人们了解和接受。孔子不是一个隐士或雅人，而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一个不断使得思想和生活联系起来的人物。在钱宁这里，孔子遇到的问题和我们相似，世界都处在一个价值和生活剧变、日常生活不确定和价值转型造成的问题和危机格外严重的时刻。

另一部分小说则对于“现代性”本身作出反应。像王蒙的《青狐》是对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回忆和思考，他似乎有对于80年代进行清理和反思的雄心。这本书也给了我们一个再度开放时期的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有趣的勾勒，也可以看出王蒙为“新时期”文化中的种种价值、思想、生活方式的冲突和混杂树碑立传的企图。王荒的《幸存者》则将眼光放在了90年代初的中国，以一个中关村新兴的IT企业的小职员的一个星期七天的经历，讲述生活中琐碎的形形色色的故事。七天里这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女职员经历了种种诱惑，终于对人生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小说从21世纪的今天回忆90年代初，也发现了全球化和市场化带来的沧桑之变。这几部书都是虚构小说，却都将我们带进了我们自己的历史之中，也让我们看到了“感性”的20世纪中国在这样的路上走来。今天的所谓“和平崛起”的“新新中国”却是由这样的道路走来的，这让我们增加成熟的智慧。

范稳写的是20世纪在中国偏远的边地的少数民族地区，西方宗教的传播与本土文化的复杂的关系。这是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范稳却不可思议地将其中的复杂和微妙写得非常精细。他写出了西方宗教传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时的冲突和悲剧，也写到了“文革”的冲击，直到80年代一场感人的不同宗教之间在国家力量主导下的和解和宽容的实现。这些过程在范稳的笔下展现了某种传奇的力量。他一方面试图表现宗教的神秘和深入人心灵的超越性的存在。这种超越性使得宗教的力量一直存在并影响人们的生活。这种超越性让宗教具有力量，让信仰能够穿透某种人生。范稳有对于宗教的一种同情的理解。但另一方面，范稳也异常深入地表现了宗教的世俗性。他表现了西方的宗教的传入与殖民主义的历史关联，也表现了本土宗教与不平等的社会和压抑性的秩序相联系的方面，也写到了许多力量在宗教问题中的微妙的互动。范稳在涉及复杂的文化纠结的时候没有任何简单化的倾向，而是将历史的复杂性和文化与宗教的复杂性变成了他的感性而细腻的故事的前提。他试图不是用理性的判断，而是用具体而微的感觉、印象和事件让人充分意识到他所表现的多民族聚居的澜沧江峡谷中人民的命运的复杂和丰富。范稳饱含着对于这些人民的历史、宗教、感情、记忆的高度的关爱和眷恋，以一种感性的力量穿透整个20世纪历史在一个边远的地域的展开。这种展开一方面紧密地牵连着中国的整个社会文化的变迁；另一方面，也有极为独特的地域和族群的特色。范稳能够体察不同文化和宗教的沟通

和冲突中的多重性，也通过表现革命对于西方宗教在这一地区传播的终结，展示了20世纪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的能量。范稳对于20世纪的中国历史没有简单化。他写到了“文革”的偏执和片面的乌托邦，却又异常真挚地表现了国家对于边地人民具有的正面的含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和西方及日本这样的国家不同。西方和日本都在自己的现代历史中扮演过殖民或欺侮“第三世界”的角色。他们的现代性的历史具有某种深刻的负面要素。于是不断导致知识分子对于国家的尖锐批判。而中国历史在现代以来一直是受到列强的瓜分和凌辱。它的命运较纯洁、干净，没有一种历史原罪。现代历史持续的失败和挫折使得中国的伦理负担较少，凸现了中国的现代性的民族国家话语的历史的巨大价值。而中国人民在当时的牺牲和代价的价值在于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历史合法性。范稳通过边地少数民族的历史和人生的展开，展现了中国的历史性崛起的国家基础。

3

在历史意识的新的发展之外，新的面对现实的观念也在兴起。这种观念力图“重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历史，提供一个新的观察今天日常生活的角度。一方面将消费主义和日常生活的意义再度审视，另一方面提供多侧面的日常生活的经验性的表述。这里有大量的作品可供分析，我仅仅举出徐坤的《爱你两周半》和贾平凹的《秦腔》作为例证。因为它们都具有高度的代表性。

徐坤的《爱你两周半》是以“非典”为中心事件的小说。“非典”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对于“意外”的观察的特异的机会。偷情的房产老板顾跃进和电视节目主持人于珊珊的偶然的幽会居然遇到了被隔离，插曲变成了常规化的日常生活，反而凸现了两个人的相互不可忍受和相互厌倦。意外的到来将原本的欲望的满足变成了幻灭。房产老板期望的欲望满足和主持人期望的成功都被难为掩饰的尴尬和被动所淹没，而顾的妻子梁丽茹和董强的偷情之旅也变成了糟糕和难堪的片段。日常生活中的有意义的事情变得微不足道而一些原本无意义的微末细节的意义变得举足轻重。这种不可思议之处给了关于“非典”的文化想象一个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价值。“非典”这个意外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